

# 洞见： 我们这个时代的 思想判断

文汇学人——编

**INSIGHT**  
**THE IDEAS ABOUT OUR TIMES**

世界  
·  
中国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 洞见： 我们这个时代的 思想判断

文汇学人——编

**INSIGHTS**  
**THE IDEAS ABOUT OUR TIMES**



编者前言

## 他们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 是我们时代思想判断的一部分

2010年12月19日，微寒。上午，弗朗西斯·福山在复旦大学做完“中国模式：历史渊源与未来前景”的主题报告之后，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林曦博士陪同，准备驱车前往上海市区参观。当时的《文汇报》理论部记者田晓玲第一时间等候在那里。作为上海人，她主动承担了陪同福山游览上海的工作。游览豫园、逛新天地、观黄浦江……大半天下来，故意不涉学术话题，只想为福山的下一次到来和可能的独家专访“暖场”。在外滩与福山告别时，《文汇报》记者指着远处的文新大厦对他说：“希望您下次来到上海，到《文汇报》坐坐……”

“到《文汇报》坐坐”，没想到来得那么快。差不多半年后的2011年6月17日下午，福山坐在了文新大厦二楼的报告厅“文汇报讲堂”的嘉宾席上，与上海学者张维为做了一次有关“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对话，并且在次日即将离开上海返回美国前，在外滩的华尔道夫酒店接受了《文汇报》记者一个多小时的独家专

访。这篇题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根除恐怖主义”的长篇专访，于“9·11”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的9月5日，整版刊发在“文汇学人”版面上——它也差不多是这位眼光敏锐的国际政治学者就“9·11”十周年的话题所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

约定并独家访谈成功福山，只是长时段的“文汇学人访谈录”中的一个工作片段。创办100多期以来，“文汇学人”筚路蓝缕，瞄准国内外顶尖学者展开学术访谈，内容涉及“文汇学人”认为应当有所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话题，其中包括：金冲及、杨天石谈辛亥革命100年，乌尔里希·贝克谈“风险社会”，巴尔舍夫斯基谈中国人世10周年，戴维·梅森谈“占领华尔街”，吉迪恩·拉赫曼谈“愤怒之年”，大卫·哈维谈欧洲危机，迈克尔·桑德尔谈“市场与社会”，皮萨里德斯谈全球劳动力市场，达龙·阿西莫格鲁谈包容性创新，林毅夫谈“新结构经济学”，傅高义谈“邓小平时代”，杰里米·里夫金谈“第三次工业革命”，舍恩伯格谈“大数据时代”……100多期，七八十万字的访谈，“文汇学人”无非想表达这样一种素朴的愿望：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总有其超过常人之处，很多时候，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总是有所助益的。“文汇学人”记录下他们在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也许能够为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一些派得上用场的资料。结集在这里的文字，就是从“文汇学人”这100多期的访谈录中精选而成，庶几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之一部分。

当年为这份访谈录作出贡献的团队成员包括：田晓玲、李纯一、任思蕴、祁涛、杨逸淇、季桂保。结集成书，也是为他们的工 作留下一份印记。

# 目 录

## 不患贫而患不安

伊安·约翰松	要避免无节制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	3
涛慕思·博格	全球规则制定应当倾听穷人的声音	14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全球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25
威廉·恩道尔	不患人口太多,而患资源分配不均	35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经济发展不能将世界大部分人口排除在外	46
青木昌彦	制定政策要考虑人们的预期	57
钱永祥	社会急速变动使价值和规范无法成型	67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根除恐怖主义	77
吉迪恩·拉赫曼	有一种全球情绪叫“愤怒”?	87
戴维·梅森	“占领华尔街”触及美国社会的神经	97
雅克·阿塔利	欧盟未来取决于利益攸关方有否共识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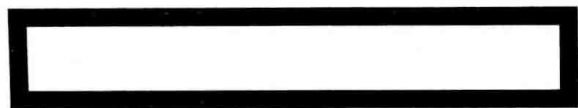
## 站在世界再造的起点

乌尔里希·贝克	“技术设计完全安全”的神话破灭了	121
凯文·凯利	面对技术的包围,人类应当有所选择	130
戴维·罗森布鲁姆	公共部门需要更高的道德伦理素养	140
达龙·阿西莫格鲁	“包容性”制度有利于释放创新潜能	150

杰里米·里夫金	通讯和能源结合,才会带来经济样式的巨变	160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大数据时代带来更理性、更可靠的决策	171
沃尔特·米德	美国正在社会再造的起点上	182
小约翰·柯布	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中国所要避免的	191
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是聚集智慧、推动创新的必要载体	201
莎朗·佐京	小型集市、传统街市更有人情味	212

## 无极化世界里的中国身份

俞可平	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	225
乔舒亚·库珀·雷默	国家形象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234
杜赞奇	我们现在更需要一个彼此依赖的世界	243
黄仁伟	未来世界格局将走向“无极化”	253
查伦·巴尔舍夫斯基	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	264
傅高义	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应该更加自信	274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中国,“早熟的超级力量”及其国际角色	284
林毅夫	以“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复兴	295
胡永泰	追赶之后才可能有制度创新	307
张军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动车组”时代	317
蔡昉	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327



**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

世界·中国

**不 患 贫 而 患 不 安**







伊安·约翰松

## 要避免无节制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

采访 | 季桂保



伊安·约翰松

Ian Johnson

罗马俱乐部秘书长。先后在威尔士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并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他曾在世界银行工作26年，担任过世行能源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家，1998年起担任世行可持续发展副总裁，2000年起担任国际农业研究(CGIAR)咨询部主席。在加入世行之前，约翰松是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并有5年时间在孟加拉国为联合国和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2010年，他开始出任罗马俱乐部的秘书长。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学度过的人，一般不大会错过《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这本书。声誉卓著的“走向未来丛书”于1984年出版它的第一辑时，《增长的极限》中译本就是其中最早出版的两本图书之一。

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在中国刚刚起步；《增长的极限》一书对人类增长方式提出的反思、对人类无节制消耗自然资源发出的警醒，在“发展”逐渐开始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国，如同方枘圆凿，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从全球范围看，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已经使得当今的人们对可持续与全球均衡发展有了足够的共识，但是，在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时，人类尤其是西方社会还沉浸在发展主义的乐观情绪之中。

有人说,《增长的极限》是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书。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难免有夸大之嫌。毕竟,在《增长的极限》出版之前好几年,就已经有了《寂静的春天》《人口炸弹》之类的图书提出了类似的警醒。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增长的极限》一书与同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只有一个地球》报告,共同拉开了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于是,才有了1984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也才有了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

作为全球著名的智库之一,罗马俱乐部在2012年《增长的极限》迎来40周年之际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尽管穿梭于全球各地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罗马俱乐部的现任秘书长伊安·约翰松还是认真阅读了记者提出的各个问题,并且通过书面方式一一予以详尽的回答。

## **认为增长本身存在问题,是《增长的极限》备受关注的的主要原因**

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推出了《增长的极限》,这是它成立4年后推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当年成立这一学术团体以及推出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1968年4月,来自全球外交、工业、学术界和市民社会的专业人士组建了罗马俱乐部,旨在探讨当时国际事务中盛行的短视思维所导致的困境,尤其关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出现的对资源的无节制消费行为。

1970年，罗马俱乐部借助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着手分析研究全球经济的总体演进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更早的时候是由杰伊·福雷斯特(Jay W. Forrester)创立的。

发表于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团队做出，其成员包括丹尼斯·米都斯、唐纳拉·米都斯、于尔根·兰德斯和威廉·伯恩斯三世。这项研究的新奇之处在于，它借助计算机设计了一个LTG(增长的极限)模型，当整个系统随时间变化时，它能跟踪各项变量及其相互作用。

这些研究者对未来世界设定了各种不同方案。该报告提出警告说：人类面临太多的问题，必须竭尽所能解决这些问题以维持自身的生活质量。报告特别指出：如果1900年到1972年间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下去，人类将在2000年到2100年间的某个时刻突破地球可以承受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提出了人类将面临人口爆炸、粮食危机、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重大危机，并因此提出了“零增长理论”。当时全球尤其是西方经济正处在“二战”后黄金增长周期的顶峰。罗马俱乐部的悲观预言，是否同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实际弥漫着的浓厚乐观情绪极不协调？

以为《增长的极限》是要倡导“零增长”，往往是一种误解。使用“预言”一词则是另一种误解。《增长的极限》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预言”，而只是描述了照原有趋势走下去可能会出现何种局面，并且为人类利用资源提供了“可调适的设想”。它为人类未来探寻出一系列可行的方案，但从来没有做出预言说未来会怎样。

诚然,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布之际,世界正处在“二战”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发展时期,当时,乐观主义以及技术进步的信念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核能正热、汽车满地,1968年人类还征服了月球,世界的未来一片光明。《增长的极限》提出的观点则与这种总体的情绪相悖,自然使人们感到吃惊了。

同其他所有新理论、新观点一样,这项研究引发了争议和批评,但也受到广泛关注,发行了几百万册。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当时乐观情绪盛行,这项研究还是使人们意识到埋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疑虑:我们能否永无止境地增长?在有限的星球上能否无限制地消耗资源?类似问题在40年后的今天变得更为重要。眼下的世界面临着系统性危机。人类正在同严重的贫困、失业、环境压力和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体系做斗争。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原有的增长范式并没有为人类应对这些挑战寻找到正确答案。

我们知道,《增长的极限》发表次年,就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全球自然灾害也频繁出现。如果没有这些事件,《增长的极限》是否不至于像它现在那样畅销全球呢?

毋庸置疑,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类似1976年意大利塞维索农药工厂爆炸之类的环境灾害,推动了《增长的极限》的传播。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是在目睹了媒体上的灾难画面,或者是在个人的经历中付出某种巨大代价之后,才会去关注《增长的极限》所传播的观点。

在我看来,这些事件还不是促成《增长的极限》在1970年代畅销的主要原因。其他著作,包括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已经提醒人们关注资源消耗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这些著作已经涉及这样的看法：消费主义与无节制增长亦步亦趋，会给人类未来带来问题。此外，1968年的社会运动也促成整个社会质疑当时的社会结构，并对之前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加以更细致地重估。

《增长的极限》在当时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敢于打破现代的一大禁忌，认为增长本身可能存在问题。罗马俱乐部勇于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引发了人们对现代经济体系之可行性这一根本问题的广泛讨论，由此也招致了很多批评。

《增长的极限》发表之后，受到的批评也是非常之多，比如：朱利安·西蒙撰写《没有极限的增长》，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认为：“如果他们在计算时考虑了技术发展的因素，那么就根本不会得出地球资源即将消耗殆尽的言论”；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更是宣称：“当人类自由地追寻梦想时，根本没有增长的极限，因为人的智力、想像力和创造力是无限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

我们不能过于自信地以为技术创新最终必然能解决人类现实和将来的一切问题。认为科学技术将会以几何级的速度无止境发展，这样的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技术创新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观点既不靠谱也很危险，因为未来的发展进程很可能会出现技术创新无法解决的特殊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创新要想以令人难以想像的方式改进当下和将来的问题，就必须有前瞻性的思维和研发投入。这也要求不再沿袭常规的商业路径，停止对后人赖以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不

负责任地加以破坏。

## 反思当前的增长范式，使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体现增长质量

众所周知，《增长的极限》报告是由MIT的4位年轻科学家撰写的。他们专业的科学背景使他们提出了非常具有预测力的分析模型。但是也有批评者指出，正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专业背景所限，因此，这份报告无法真正揭示出造成危机后果的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原因。这样的批评是否有道理？

我们并不把这看做是一种批评，因为那份报告只是根据当时掌握的信息来设计方案的，其尽可能地追求客观中立，与任何政治的、宗教的或经济的意识形态没有关涉。

《增长的极限》提出：“现今对于自然资源和服务的占用早已超出了地球的长期承载能力……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享受与北美同样的生活标准，那么在目前技术水平下我们就需要3个地球来满足总的物质需求……为了可持续地适应未来40年人口和经济产出的预期增长，我们就需要另外6到12个星球。”问题在于，对于许多后发现现代化国家而言，“零增长理论”是否有悖于发展的公平正义呢？

我们并没有倡导“零增长”。我们认为，增长的质量更为重要，要避免无节制的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人人都有获得理想生活标准的权利，人人都可以追求幸福。不过，无节制的增长不会给人类的愿景带来答案。增长和发展纠缠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应该获得自身的发展机会，但它们必须意识到，增长的质量对它们而言同样重要。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反思当前的增长范式，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能

同时体现增长的质量。依据当下的发展模式的话,发生车祸有人受伤,也同样能提高GDP,伤员住院、汽车修理、修复路面受损,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促进GDP增长。但是,社会因此而变得更富裕了吗?人们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吗?

在《增长的极限》发表两年之后,罗马俱乐部又于1974年推出了《人类处于转折点》一书,指出人类面临的人口、粮食、能源、环境危机等是全球性危机;与过去的自然灾害不同,这些危机都是人为的。然而我们同时看到,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依然没有减轻,比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2011年的日本地震和海啸。人类真的找到了很好的办法来应对自然灾害了么?

气候变化扩大了这些事件的范围,强化了它们的影响力。自然灾害的发生表明,人类自以为在技术进步的社会可以阻挡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这样的想法完全错了,因为大自然要远比人们想像的强大。因此,我们应当在减少碳排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便尽己所能地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这些事件表明,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排方面达成共识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小国和经济体量不大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从1972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增长和全球粮食产量的真实数据,与罗马俱乐部1972年依据WORLD3模型标准运行预测到的数字几乎完全一致,即全球人口从1972年的39亿增加到大约60亿,全球谷物从1972年的每年18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30亿吨。我们想知道的是,当年的这份报告是否也有一些看走眼的预测呢?

如上所述,《增长的极限》并不是要做出预测,而是要针对未来提出多种可能性的方案。我们的分析模型在1992年做过更新,该书出版30年后又做了一次更新,并于2004年再版。由于能不断更新,我们的分析模型就没有必要大修大补了。从1972年的研究水准来看,MIT研究团队的这份报告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 全人类可以从东方传统思维中学到很多东西

在《增长的极限》发表30年后,《增长的极限》出版了它的第三版《增长的极限:30年全球经典》,认为地球的生态状况更加恶化了,生态系统给人类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再不进行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上的革命,21世纪就注定要成为灾难甚至灭绝的世纪。技术和市场能否为人类带来扭转这一趋势的新希望?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不是预言,而是使人更为悲观的可能情形。

诚然,技术进步为人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资源、减缓对自然资本的掠夺带来了新的希望。罗马俱乐部成员之一魏伯乐(Ernst Ulrich von Weizscker)撰写的报告《五倍级》(*Factor Five*)揭示了业已存在的具体解决方案,认为技术创新和政策改进有可能使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五倍。

“稳态经济”或“循环经济”可以有效替代当下的经济模式,同时也会带来就业新机会。但是很不幸,绝大多数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还没有为变革做好准备,它们阻碍了推广上述新经济理念的新政策的实施。绝大多数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依然舒舒服服地因循守旧,从而为未来埋下了隐患。我们最终必须承认,变革才是当务之急,尤其当变革的因素已经近在眼前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当机立断进



行变革。否则，我们如果再等上又一个40年，一切都晚矣，到那时，人类将面临难以逾越的挑战。

2012年是《增长的极限》第一版出版40周年，该份报告是否会再次更新，也许会提出更充足的数据来验证“过冲”的现实？

1972年，《增长的极限》就已经指出，要创造条件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理想的世界，为人类带来稳定、可持续和全球均衡的发展。在2012年的纪念过程中，罗马俱乐部有机会回顾过去40年所做的分析、新的进展与现实，从而为未来的40年提供全新的视野。

当下的关键问题，不仅仅是人类能否在地球的限度内维持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于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罗马俱乐部的“2052年框架”旨在以过去40年的探索性工作为基础，解答“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人类究竟应当如何作为，才能使我们的星球在特定的限度内走上新的稳定发展道路”。

此外，《增长的极限》合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2012年出版了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新报告，题为《2052》。该书结合全球范围内的预测手段、兰德斯本人在可持续性研究领域的经验，以及30多位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预见，为我们展示最有可能呈现的未来图景。该书并不是要引发人们的恐慌，而是要使我们为变革做好必要的准备。

在进入新千年之后，罗马俱乐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警告：科技无法抑制全球变暖的趋势。你们还会就此推出类似《增长的极限》那样为全球关注的报告么？